

【理论与方法】

#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 考古学认知及其历史逻辑

霍巍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考古学报》(京),2024.1.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学术成果。

## 目次

- 一 中华文明的考古学标志
- 二 秦汉一统的考古学考察
- 三 南北朝、隋唐以降的考古“中国”
- 四 结语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存在并且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早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一个巨型社会中维持了稳定,在一个广袤的国度实现了政治统一”的实体,而这个实体所形成的“国家君主制”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计有二十二个朝代,“在官方史书中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相互承袭,其间没有任何哪怕轻微的间隔或中断”,而“统一是帝国君主制存在的理由”,这是“中国社会和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创性特征之一”<sup>①</sup>。由此可见,对于中华文明特性的认知和探索,早已成为东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的重要讲话站在时代的高度,回顾并展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五大特性,成为迄今为止对中华文明最为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相对于文献史学而言,中国考古学叙事的时空范围大大超越了文字记载,如同苏秉琦所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sup>②</sup>。因此,如何从考古学上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从中探索这些特性形成的历史逻辑,将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 一、中华文明的考古学标志

何谓“文明”?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是否有过统一的标志?中华文明的考古学标志应该如何加以认定?关于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曾经展开过长期的讨论,至今依然十分热烈。关于“文明”一词的语义源流,中西方其实各有其表述。廓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及其与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互比较至关重要。

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含义广阔,对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或借用拉丁语词根的其他语言表

述、源流演变及所涉内涵的讨论浩若烟海,本文不拟赘述。大致而言,西方的文明是和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这些表述在同一语境下产生的。在西方的所谓“古典时代”,除希腊、罗马文明以外的文化都被视为野蛮。而在中世纪,除了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外的文化也被视为野蛮,虽然当代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已不再采用这样的表述,但其历史印迹难以磨灭。而中国的“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乾·文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正义》:“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冯时对此的解释是,所谓“天下有文章而光明”,这里的“文”也就是“文明”之“文”,从表象上看是指先民根据龙星东升天象的观测以行农事,始生万物而享有丰年,终至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其本质所强调的实为人文之彰著,反映了古代先民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天人关系的独特理解,以及深刻的文化思考与文明传统<sup>③</sup>。尽管中国古代也有过“华夷之辨”,将华夏周边的族群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的说法,从广义上而言也可视为一种文明观。但究其本源而论,《周易》所说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在内涵上明显有别。

将文明这一概念引入到考古学的西方学者可以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为例。他基于摩尔根关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三段式”划分法,用“食物生产(food production)”来区分“兽性”与“野蛮”时代(二者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又以“城市革命”来象征文明的出现。他认为,一定的聚落规模和人口密度是文明的必要特征,由于农业革命导致史前社会专门化,旧大陆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有了纪念性公共建筑、文字系统和实用科学、长途贸易、艺术家、专业工匠集团和祭师等十个“城市革命”的特征<sup>④</sup>。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在这份清单上又陆续增加了青铜冶炼、水利灌溉农业、较大规模的牲畜饲养及利用车轮的运输工具等要素<sup>⑤</sup>。

但是,这种将文明视为各种单项因素拼凑的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为“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史观。基于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文明的标志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如童恩正指出的那样:“由于各古文明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此处成为文明标志条件的,在他处并不存在。如金属器的使用在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全部马雅的古典文明都是建立在石器生产的基础上的。畜牧业是近东古文明的主要成份,但在中美古文明中却不占什么地位。又如城市是苏末尔古文明最明显的标志,但埃及城市却出现在其他文明因素形成之后。”所以,这种史观“难以反映人类历史这一极端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阶段”。他进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从考古学上看,文明的因素最关键的表现是什么?文明的标志在欧洲、南美、非洲、亚洲是否有所不同?每一个社会在进入文明时是否又有自己的特征?这些都需要进行长期细致的研究,绝不能说现在已有统一的结论了。”<sup>⑥</sup>直到今天,重温这段童恩正之问,也同样发人深省。

布罗代尔认为:“事实上,‘civilization’至少是一个双义词。它既表示道德价值又表示物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区分了经济基础(物质上)与上层建筑(精神上)——在他看来,后者严重地依赖于前者。”<sup>⑦</sup>他的这一表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标志颇具启发意义。如果仅从物质表征上看,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极具影响力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在目前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只能追溯到约3300年的历史,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开始才算进入文明。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科研项目的实施,中国学者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大型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发现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如王巍、赵辉提出这些

特征包括:第一,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第二,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第三,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早期城市;第四,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第五,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第六,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第七,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第八,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sup>⑧</sup>。在上述特征之外,他们还提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国家的出现除了通过当时的文字资料证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过考古遗存加以辨识,如都城、宫殿、王和贵族的大墓、表现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战争与暴力等考古遗存。他们认为,“这几条标志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些特征“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sup>⑨</sup>。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的公布,正在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反响和深入的讨论。

文明起源和文明标志的认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有时间的维度,也有空间的维度。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在不同的时间轴上有着不同的特征。在空间上,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人群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也能创造出具有区域性特点的文明因素。因此,就中华文明而言,还应当格外重视作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精神文明要素。如冯时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明观的首要义涵乃在于对古代制度及宇宙观的建立,准确地说,古人定义文明并不特别注重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至少不以其为阐释文明的第一要素。物质文明所展现的技术进步事实上是为政治与宗教服务的,而与物质文明相比,先民早期知识体系、礼仪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则在根本上体现着人类摆脱野蛮状态最重要的标志,成为

界定文明诞生的真正标准。很明显,由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是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共同构成的,因此,以重建古代历史为己任的考古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忽略对古代制度与形上思想的探索”<sup>⑩</sup>。这也为我们认定中华文明的标志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意见。早在冶金术和文字产生之前,从中国各地史前时代的考古遗存当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对后世中华文明核心内涵产生过持续性重大影响的诸多文明要素。兹列举以下数例述之。

### (一)玉器时代及礼玉制度

与世界其他古文明不同,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而这又是从美石到礼玉,是从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早在距今约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当中,已经出现了玉质装饰品;在距今约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墓葬中,已发现较为精美的玉坠等装饰品。到了距今约5500年前,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双手捧于胸前的玉人,已经具有某种特殊的原始宗教含意。至距今5000—3800年,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已出现用于高等级墓葬的“玉敛葬”和祭祀先祖与天地、山河的礼仪性用器,与后世三礼文献中所记载的礼玉系统吻合。尤其是各地出现的玉璋(有的称为牙璋)、玉璧和玉琮,更被认为是玉礼器中的重器,不仅在时间上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在空间上也覆盖了几近大半个中国<sup>⑪</sup>。在青铜器产生之前的史前中国,玉器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很显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是中华文明标志性的象征之一。

### (二)龙形象的构建及其象征意义

龙的形象在远古中国各地的构建,也体现出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标识。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蚌塑龙、虎形象的发现<sup>⑫</sup>,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由绿松石镶嵌的龙<sup>⑬</sup>,再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当中出土的多种青铜翼龙形

象<sup>④</sup>，以及各地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出现的龙的图案和形象<sup>⑤</sup>，无不体现出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广泛的象征意义。它初始期很可能与其被赋予能够升天潜渊、沟通天人的寓意有关，后世则发展成为王权和皇权的象征。

### (三)独特的宇宙观与天人关系思考

从考古学上还反映出，早在史前时代开始，古代先民已经在农业活动中观测天象，辨方位位，并由此形成关于空间与时间的规划与思考。据冯时对中国传统文明中有关古天文学的研究，在平面关系上，史前先民已有对子午线的重视，以及由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和“四方”的观念。由此影响到后世诸如四方、五位、中央乃至中域、中土、中国、中原等政治地理概念的产生以及都邑、宫殿、王庭、莹域的布局。由此还相应地产生出中和、中正、“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念。在垂直关系上，则对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先秦以来诸如帝、天帝、天极(北极)等观念，“受命之帝居于天之中央——北极，人王若要依天立政，就必须居于地之中央”。秦汉以来的仙界、升仙、昆仑神话等一整套有关空间、时间的基本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均可由此溯其源头，从而将时空体系与阴阳哲学彼此结合，建构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传统<sup>⑥</sup>。他所依据的考古材料包罗甚众，从出土的陶器文字、龙虎形象、早期圭表，到都邑遗址、古代墓葬、祭祀遗址等均有涉及，对于中国上古文明中先民早期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的观察与分析，都大大拓宽了既有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之所以要对中华文明的考古学标志进行讨论，正是因为无论是从“文明”一词的定义出发，还是从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丰富实践及其取得的成果出发，都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定义和内涵的探讨，不能简单地照搬或者移植其他文明的固有“标准”，完全脱离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如同冯时所言：“不同文明的

文化背景与文化理解根本不同，生搬硬套其他文明的理论作为己身文明的研究标准不仅圆凿而方枘，甚至将直接导致错误结论的得出，无法揭示己身文明的真正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文明更多地强调形上思想与礼仪制度的建构，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古文明时必须充分加以关注的问题”<sup>⑦</sup>。上文中所述及的诸多早在史前和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的基本观念都持续发展后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例如，由玉器的礼仪性特征发展到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制度；由史前龙崇拜发展而来的王权与皇权的象征；源自史前时代以圭表测时而来的“中”与“中和”的政治理念，反映在历代国家都城或都邑设计思想之中，从都城的选址、宫城位置、宫庙关系、中轴线布局、陵墓与礼制建筑等方面都得到具体的实践<sup>⑧</sup>；由“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等观象授时源起的自然崇拜、“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天地交合、阴阳刑德等观念发展到后世中华文明的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都无不体现出中华文明自身的特性，成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最好的证明。

## 二、秦汉一统的考古学考察

中华文明“大一统”的突出特性既是儒家思想的传统理想，更是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族群、疆域、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综合发展的客观历史现实，海内外学术界对此也高度关注。《剑桥中国秦汉史》写道：“在公元前221年，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sup>⑨</sup>

虽然我们将秦汉时代作为中国统一的开端，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发展的历史演进之后形成的结果。对于这个过程，学术界讨论甚众。苏秉琦先生曾经描述称：“五帝时代以距今5000年为界可分以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

与治水。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sup>③</sup>。尧舜时代虽然“万邦林立”,但各邦通过朝贡、诉讼,由四面八方共称之“中国”,逐渐开始承认万邦之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是“共识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形成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是秦汉时代,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再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这就是他所归纳出的中国国家起源“三部曲”的发展历程<sup>④</sup>。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根据对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约5800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遗址及其所在地区的考古工作,以及对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考察,也提出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大约在距今5800年前开始,进入到“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邦”、“国”相对应,史前中国开始进入到“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到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形态,步入文明,如良渚、屈家岭—石家河、红山文化等。大约在距今4300—3800年(即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以山西陶寺、陕西石峁、芦山峁、四川宝墩等规模巨大的古城为代表。到了这个时代的晚期(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二里头文化诞生,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开始形成并向四方传播,这“不仅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sup>⑤</sup>。

夏商周三代文明正是在王朝时代的基础上建立的<sup>⑥</sup>。其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又经历了从小国林立到大国争雄,最终由秦灭亡东方六国,实现天下一统、

天下一家的政治大格局。很显然,秦汉的一统正是经历了从万邦林立到天下一家的历史发展之后,方才最后形成的一个“华夏共同体”。从考古学考察秦汉王朝的统一,可着重观察这一时期对于中华文明具有深远影响的关键性制度的建立,也可以由此充分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笔者拟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讨论。

### (一)郡县制的推行与变革

秦统一之后,创立中央集权体制,并在全国设立郡县制,实施由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有学者形象地将这一制度称为一杆子插到底<sup>⑦</sup>。它不仅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基本疆域的国土实现了郡县制的全覆盖,而且随着秦汉王朝的扩张,逐渐将岭南、西南、西域等纳入这一体制之中。这个制度在政治设计上的最大特征是由郡县官僚体制将中央王朝的施政、法律、文化、经济等直接渗透到社会基层,影响到乡、里。

郡县制源于春秋时楚国的县制。这一制度是对西周以来封君采邑制的修正,县级长官由国家设立,君主派任,不能世袭,从而大大削弱了贵族卿大夫的权力,加强了君主集权。秦汉郡县制的设立,既是对前制的继承,更有创新和发展。例如,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就详细记载了秦对“新地”——即新拓展地区洞庭郡迁陵县实施郡县制管理的具体情节,体现出基层行政的精细化和与时俱进的创造性<sup>⑧</sup>。汉武帝时期,与郡县制相协同,对于一些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地区,采取了灵活的“因其故俗”的方针,一方面实施郡县制,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边地原有的“王”、“国”等体制,实行双轨制管理,最终完成郡县化。最典型的例证是近年来云南滇池汉代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个遗址与滇王国的都邑、陵墓毗邻,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官私印泥、竹简等文书档案,有可能系汉代所设益州郡的郡治所在<sup>⑨</sup>。这个遗址的发现生动地诠释了汉代在西南夷边地推行郡县制的历史进程,也是对其创造性的很好说明。

## (二)“书同文”与统一文化建构

仅从字义上看,所谓“书同文”是指秦灭六国之后用秦通行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建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统一文化体系。笔者认为,“书同文”从更为宽广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上看,是建立起中华文明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关键性制度之一。

从世界各国古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而论,文字的诞生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地中海文明都曾经在距今数千年之前便出现了文字,所以西方学者提出文字与冶金术、城市的出现同为文明三要素。但是,唯有中国使用的汉字系统是迄今为止的活的文字,而不是某些西方古代文明中的死文书。中国汉字系统的发展历史同样十分悠久,其经历过新石器时代、殷商、两周、战国、秦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sup>①</sup>。虽然目前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字”阶段的研究尚在进行,对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等发现的文字的释读与认定也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可以推测,中国古代也可能存在与今天流行的汉字系统有别、业已消亡的其他文字体系,成为中国的死文书,但中国古老的汉字系统历经久远的发展历史一直使用至今,这一事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书同文”的基础是汉字系统在国家层面的确立,是意义深远的宏大文化建构工程。秦始皇自统一次年即开始巡行天下,并先后在峯山、泰山、碣石、会稽等地立石刻铭,至今还有残石或拓本传世<sup>②</sup>,除颂赞秦之功德之外,更是用统一的文字宣行天下。秦“书同文”的深远影响在于,其使用范围首先是在汉文化流行的区域,然后逐渐向四方扩展,从而形成以使用汉字、认同汉文化、用汉字记载和传承文明的主体族群,这个主体族群即当时所谓的“秦人”、“汉人”,亦即后世所称的汉民族。两河流域文明中虽然也有过使用同一楔形文字的不同族群,如苏美尔、阿卡德、赫梯、古波斯等,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书同文”一样,形成言语、文字、族群、文化浑然一体的主体族群,而是同文不同语、同文不同种,与中国的“书

同文”貌合而神离。范文澜认为,“汉族在秦汉时期开始形成为民族”,并认为使用统一的文字是一个重要的标志<sup>③</sup>。考古发现的湖北睡虎地秦简<sup>④</sup>、四川青川郝家坪更修为田律秦代木牍<sup>⑤</sup>,虽非秦小篆而已近汉隶,但所反映的正是秦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与传播,以及周边族群逐渐融入汉文化和汉民族的真实历史片段。

此外,在秦汉时期除汉字系统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文字系统。例如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的所谓巴蜀图语或巴蜀符号,常常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的青铜兵器、乐器、铜石印章上,也有意见认为这是曾经流行于古代巴蜀地区的一种古老文字,或可称之为巴蜀文字<sup>⑥</sup>。但是随着秦灭巴蜀之后,巴蜀地区逐渐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便开始以汉字取代这种图语、符号或“文字”,这在四川发现的青铜兵器上遗有明显的证据<sup>⑦</sup>。事实上,在“书同文”的背后,还包含着以汉字承载的汉文化、儒家正统思想等一系列的文化建构。汉代文翁在巴蜀地区设立学官,鼓励巴蜀子弟学习汉文化,使巴蜀地区很快融入“中国一统”的格局,成效就非常显著。

## (三)“车同轨”与秦汉经济共同体的形成

自秦汉时代开始,通过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制度设计,变更了前世“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的旧制。所谓“车同轨”,是在辽阔的疆域上修筑道路,形成全国统一的交通标准。史书记载的秦代修筑的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战国时期各国车马大小不一,道路宽窄有别,秦代的“车同轨”统一了车的两轮之距,保证了各地交通之间的快速通畅。汉代的道路治理继续发展,形成了全国性的交通道路网络,海上交通也随之发展,从陆地、海洋通向域外的“丝绸之路”更是密切和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与“书同文”一样,笔者认为在“车同轨”的背后,实际上是与统一的经济、法律、度量衡、货币制度一

道,构建了秦汉一统疆域内的交流、交往网络,在形成秦汉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同时,力图形成统一的经济共同体。秦汉考古发现的大量铁器、漆器、铜镜、丝绸等遗物不仅覆盖了当时的中国本土,甚至在海外许多地区也有出土<sup>③</sup>。在这一总体制度之下,中央王朝的政令也达于四方。仅以四川地区为例,秦代开通的官道便有褒斜道、石牛道、阴平道、五尺道等区域性道路。汉代在此基础上又开通了南夷道、西夷道等<sup>④</sup>。四川雅安荣经发现的一通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何君阁道碑,最早见于宋人洪适《隶释》著录,2004年被考古重新发现,此碑详细地记载了蜀郡太守平陵何君治道的情形,道路“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sup>⑤</sup>。史书还记载有汉永平六年(63年)开褒斜道摩崖刻石,其铭云:“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徙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sup>⑥</sup>由此可见这些巴蜀地区的行政长官是在中央王朝统一的政策之下,有效地实施了相关的道路治理工程。

#### (四)“行同伦”与新型族群关系的建立

秦汉时代的“行同伦”并非仅限于统一王朝内部汉民族的行为伦理,而其核心要义实际上是要以汉文化融汇各个族群,突破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际关系,建立起跨越血缘、基于地缘的新型族群关系。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和“蛮狄戎夷”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在秦汉王朝统一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原属于蛮夷之地的族群开始逐渐融入汉民族,也开始改变前朝夷夏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格局。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以两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范围内的帝制中央集权为制度框架,普遍施行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学传统文脉,大多数先民初步融合为汉族,还有西南夷、南方边地少数民族及北方民族部分南迁者。制度、文化、族群三层面呈现同一或单一,是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特色。”<sup>⑦</sup>笔者认为,秦汉王朝构建的这种新型族群

关系为后世树立起典范,使得越来越多的边地族群如同滚雪球般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大熔炉。

#### 三、南北朝、隋唐以降的考古“中国”

秦汉统一王朝之后,一个最重大的变局是近两千年北方民族三次大规模南下入主中原,中国历史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迁徙、大融合的大变局。第一次是拓跋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北族的南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朝与南方的东晋南朝分庭抗礼,形成胡汉杂居、南北对峙的局面。第二次是在隋唐重建一统之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形成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政权并立的新格局,最后由蒙古人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面貌的统一元朝。第三次是在元、明重新统一中国之后,清入关,将蒙古、明残余政权及西藏、新疆等地纳入到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在经历多民族的碰撞融合之后,重塑了中华民族空前统一、多元一体的全新面貌。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最令世人震惊的事实在于,为何在如此动荡分离的形势之下,中华文明并未像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一样导致帝国的分崩离析、民族的流离失散、文明的阻隔中断?中华文明为何如同凤凰涅槃一般,在纷乱中浴火重生,以更为广阔的疆域、更为统一的政权、更为众多的民族、更为多元的文化,在一个新的统一格局之下实现了“华夷一体”、中国一统的宏大进程?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来梳理其内在机理,寻找其原生动力,认知其历史逻辑。

#### (一)政治认同:多民族共塑中国

首要的原因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北方民族南下所建立的政权,无不以“中国”自称,凝聚了对华夏的认同;以统一大江上下、大河南北为其政治目标,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内聚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努力宣扬华夏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中华”、“中国”

的概念已经超越了秦汉以来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汉民族居住区,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的文明身份。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以华夏正统自居。如远在漠北草原的柔然在写给南朝萧梁的一份文书中自称其政权为“皇芮”,并声称要“恭行天罚”、“光复中原”,以中华正统自居。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北魏和南朝政权之间的正统之争和拓跋鲜卑不断文化转型,朝着“光宅中原”的目标挺进。大量的考古证据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墓葬、石窟和城市建筑遗存当中,《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sup>⑧</sup>、《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sup>⑨</sup>、《葬之以礼:魏晋南北朝丧葬礼俗与文化变迁》<sup>⑩</sup>等著作对此都有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兹不赘述。

这在文献上也有明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梁纪》,连南朝的陈庆之洛阳之行后也感叹:“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在据有燕云地区之后,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在辽代鲜演大师碑记中便自称为“大辽中国”<sup>⑪</sup>。西夏人虽未自称中国,但却认为其系“华夏正统”,其开国君主李元昊立国之初便遣使向宋朝皇帝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宋人虽不承认辽为“中国”,但在辽宋交往之间则互称“南、北朝”,“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sup>⑫</sup>。王明珂注意到,出于南朝士人之手的《南齐书》与《宋书》均不认同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孙”而仍视其为“虏”,但到了较为晚出的《晋书》则接受许多北方异族贵胄家族为“黄帝子孙”,他认为其中重要的背景是“此时所谓的‘五胡’早已融入华北汉人社会,他们许多出自名门者,甚至在唐代中国朝廷任官”<sup>⑬</sup>。唐代李延寿所撰《北史》,便已将北魏的祖源记为出自“黄帝轩辕氏之后”,加深了这一认同。

总之,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各代,北方入主中原的各族无不在政治上高度

认同中原的政治制度,主动选择以中原华夏正统地位自居,行一统之道,承续中华道统,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虽然南北之间曾经战乱频繁,却都是在中华文明一统的总体框架和更为宏大的时空格局之下展开的相互竞争,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多政权共塑中国的历史景观。尤其还须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北魏的府兵制、均田制等许多制度也被唐王朝所吸收,成为中华文明制度创新的典范,在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创新性特征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 (二)文化认同:从华夷之分走向华夷一体

这个历史阶段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民族意识被极大改观,文化认同成为区分“中华”标准和“文明”标志的唯一前提条件。陈寅恪早已指出,此时之民族,不是以血缘,而是以文化来加以区分的。他还强调:“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⑭</sup>对此苏秉琦从文物考古的角度也有过相同的论述:“‘五胡乱华’是一个贬义词,但它与欧洲人所谓的‘蛮族入侵’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民族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反映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结合的、辉煌的北朝文化遗物,从东汉末年的和林格尔壁画墓,到云冈石窟、司马金龙墓、北齐娄睿墓等乃至平城等北朝的都城建筑,以及在瓷业、农业、科技方面都是北朝留下的堪称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它还带来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各种信息,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的贡献。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都源于北朝。”<sup>⑮</sup>

文化认同的精神内核是对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并由此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语言文字、艺术创造等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表现在考古学的物化表征上,也是多方面的,

刘庆柱从魏晋以降历代王朝都城、陵墓和祭祀建筑的选址、设计与营建等方面作过详细的论述,认为中古时代后期的西夏、辽、金、元、清王朝的统治者均出身于中原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群,“但是这些王朝的都城、帝陵选址及其建筑布局形制与相关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充分揭示了他们对中华文明核心理念的认同”<sup>⑥</sup>。

相较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以降,辽、金、西夏、元、清各朝,汉文化的影响从地域上也扩大到塞外漠北、青藏高原和西南边地,拓跋鲜卑、吐蕃、南诏、契丹、西夏、蒙古等各民族在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以更为深层的方式实现了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以吐蕃为例,这个远踞青藏高原的地方政权,唐以来与中原唐王朝的交流不断加强,唐代使节王玄策通过吐蕃腹地前往天竺出使,在今吉隆古道上刻下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唐代初年新开辟的中印之间高原丝绸之路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也是这个时期前往“西天”求法的唐代僧人和使节受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唐文成公主直接资助的证据<sup>⑦</sup>。吐蕃王朝曾多次派遣王室子弟前往唐代京都长安学习汉文诗词及典章制度。据文献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倡导国学,唐朝国子监盛况空前,“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而其中“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sup>⑧</sup>。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唐王朝还曾敕令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学习经业者,“宜附国子学读书”<sup>⑨</sup>。吐蕃通过与唐朝和亲,向唐朝索求《论语》、《诗经》等儒家文献。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便有数种译自汉文的儒学文献典籍残卷<sup>⑩</sup>。

辽、金和西夏虽然政权鼎立,但从典制到律法都共承“中国之制”。例如,辽代效法唐与五代官学之制,设立国子学于上京与中京,并置五京学于五京,在地方设府州县学,形成自上而下的官学教育体系,还以“唐宋之制取士”,均是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西夏建国之后颁发的《天盛律令》,无论从名称

还是体例上,都是效仿了春秋战国以降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律形式,在立法思想上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据《金史》,金朝建国之后也设立官学体制,实行科举取士,以《孝经》等儒家经典教化民众。考古发现的契丹、西夏各自铸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合体的钱币,都是模仿中原流行的方孔圆钱形制。有元一代,“华夷儒风竞起”,更是进入到“半去胡俗,半用华仪”的新的历史环境之中,儒学主干文脉影响到包括忽必烈在内的蒙古人、色目人,进而首创了“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但却“华夷一统”“兼容复合”的新型文化形态<sup>⑪</sup>,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在继承秦汉以来大一统传统的基础上又一体制机制的创新,体现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

### (三)宗教包容:政主教从、融通并存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宗教包容和多教融通之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史上政教关系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从来就未形成过政教合一的所谓“国教”(地方政权如西藏除外)<sup>⑫</sup>,而从来是“政主教从”,宗教只能依附于王权才能生存发展。佛教作为最为重要的外来宗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成功地解决了所谓“沙门不拜王者”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倡导的孝悌关系这两大难题,与中国本土几乎同时产生的道教之间逐渐相互融通,最终在唐代于佛教义理和礼佛实践两方面都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形成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各宗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禅宗。

在考古材料上,最为集中的反映是佛教造像及石窟艺术。众所周知,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都有当时皇家支持的背景,云冈早期五窟中的“造像如帝身”更是形象地反映出宗教艺术的本土化、世俗化特征。仅从佛教石窟造像中佛像衣饰的变化,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从印度、希腊风格到“褒衣博带”的汉地风格的演进历程。造像的题材和内容也从早期

南亚、中亚的传统题材发展到具有中国传统美术特点的全新模式。观音菩萨的形象在印度本为男子,但南北朝以来随着中土信众中有不少妇女参与其中,观音在隋唐时期也多变化为女性形象。道教本来并无造像,自佛教传入之后,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仿照佛教造像开始有了道教造像。唐宋时期的重庆大足、四川安岳等处石窟造像中,开始出现了大量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题材和图像,与这一时期社会上佛教哲学思想与理学、经学和道教之间相互融通互为表里。

唐代以降,先后传入中土的外来宗教还有波斯的拜火教(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遗留下来大量考古遗迹和遗物<sup>⑤</sup>,从中也可以窥见不同宗教在中土的融通并存、和平共处。例如,考古发现北周时期陕西安伽墓、史君墓、山西太原虞弘墓等粟特人的墓葬,墓中的石室、石床和石屏风上既可观察到来自中亚拜火教的神灵与神兽的图像,又采取了中原地区北朝以来的墓葬形制和埋葬方式,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入乡随俗的风习流变<sup>⑥</sup>。考古学上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福建泉州府出土的唐代以来碑刻材料,由于泉州长期以来的海外贸易活动,保存下来佛教、道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本土宗教的大量材料<sup>⑦</sup>,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对各种宗教所秉持的兼容并包态度,成为不可多得的位于中国本土城市中的一座“国际宗教博物馆”。

元、明、清三代皇家都扶持藏传佛教,并以其为纽带,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建立起蒙、藏、回、汉、满等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藏传佛教艺术与汉地传统文化之间彼此交流融汇,在首都北京(元称大都)和汉地均保留下来大批同时具有汉藏文化色彩的艺术遗存<sup>⑧</sup>。如熊文彬所言:“佛教从七世纪传入西藏伊始,西藏在接受印度、尼泊尔佛教及其艺术的同时,汉传佛教和以汉族为首的国内多民族文化及其艺术同时对西藏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相关藏、汉文献和

遗迹不少保存至今,并且从元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治理,这种影响日益显著。”<sup>⑨</sup>进而论之,笔者认为在这些考古文物现象的背后,实际是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力图通过宗教力量再造“华夷一统”格局的重大政治举措之一,如同清雍正帝《大义觉迷录》中所言:“天下一家,万物同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sup>⑩</sup>

总之,中华文明历来包容各种外来宗教,从未产生过如同西方基督教会那样势力强大、堪与世俗政权相互对立的教权组织,也从未发生过如同西方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更未有过因为宗教纷争而发生的国土分裂、种族残杀,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核心要义中的中和、包容等价值观念。各种不同宗教历史上基本能够和平共处,相互并存,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之下,为中华一统局面的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四)多元互补:统一中华经济圈的形成

如果说秦汉一统在地理、生态以及生业形态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主要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汉族为主的栖息地的话,那么魏晋、隋唐以降这种影响随着多民族的不断南下,民族迁徙和融合以空前的规模彻底打破了原以长城为界的游牧与农耕南北经济带,重塑了中华文明的经济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胡人族群大规模内迁、定居,使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更强地得以发挥。东晋南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开发,也使得南方“蛮夷”经济区快速融入农耕经济区之中。隋唐时期对西域、青藏高原、西南、东北等地的有效管控,尤其是对漠北北方草原族群的统一和使之不断内属的举措,更呈现出“胡汉交融、农牧一体”的盛大气象。隋唐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联系的加强,也为中华大地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考古发现证明,唐代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全面开拓了全国和国际性的贸易网络,与突厥、回纥、吐蕃、南诏等进行的茶马贸易、绢马贸易及盐马贸易等多种

形式的经贸往来“富兼华夷”，吸引了更多的族群参与共建中华经济圈。宋、辽、金、西夏时期，虽然诸政权分立，但隋唐以来形成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并未因此而中断，钱币铸造与流通在这些政权中均模仿中原体制，在考古遗存中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钱币为数众多<sup>④</sup>。此时农牧、游牧、半农半牧经济进一步多元互补，对于河西、内蒙古、东北地区借鉴中原汉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验，使用先进的铁制农具进行精耕细作，均有很大的提升。在河西地区发现的石窟、墓葬壁画和出土的画像砖当中，可以观察到许多农业生产的画面，其中的牛耕图、放牧图生动展现出这个时期农牧经济相互交织为一体的情景<sup>⑤</sup>。元代重建统一，基于更为宏大的横跨欧亚的国际背景，此时不仅出现了走向国际化的驿站、交通网络与统一的市场，并于元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纸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元代开辟出国际化的陆、海远程贸易体系，著名元青花瓷器远销中亚和西亚各国，在世界各地均有大量出土<sup>⑥</sup>。元兴建大都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全面开通，使有元一代农牧两大区域的整合度达到空前的程度，也为明清两代在疆域版图、不同族群、不同生态与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浑然一体的巨大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论断。笔者认为，多元互补、浑然一体的统一中华经济圈的最终形成，是从人类最为根本的生存基础上，为中华大地版图上各个族群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体系。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内生动力。”<sup>⑦</sup>这也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精神家园，从共同的物质基础这一层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路。

#### (五)吸收外来：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怀。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相比，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华文明与这些文明之间阻隔着高山大漠，陆路交通和海上交通都远不如两河流域等古文明之间便利。虽然与古印度河文明之间在地理上相对接近，但也由于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在汉代以前必须通过中亚地区才能绕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一系列高大的山结，到达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这些艰难险阻丝毫没有阻止中华先民走向世界的坚定脚步。

从考古发现来看，有可能早在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开始了与外界的交流，虽然目前的证据还十分有限，但李水城通过对权杖头这一特殊的考古材料的梳理，已经让我们看到这类在西亚、中亚和南亚地区史前曾经极为流行的、代表权力象征的遗存，也曾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中原、北方长城地带和东北以及淮河以南地区<sup>⑧</sup>。更多的证据是来自商周时期，宿白提出，西方的青铜短剑在前一千纪之初影响到中国，同时传来的还有优质高级的绿松石和玻璃制品，中国的丝织品、软玉大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向西方传播<sup>⑨</sup>。沈福伟认为，被西方称为欧亚草原诸民族三要素的兵器、马具和野兽动物纹饰，也在这个时期传入和影响到中国<sup>⑩</sup>。汉代陆路、海路两道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启了中外交通的新纪元。魏晋隋唐以后，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在陆路更为频繁，唐代中原与青藏高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联系，高原丝绸之路将此前的陆、海两道连接汇聚为一体。宋代海上丝路的发展，拓展了中华文明面向海洋的宽广视野，元代更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庞大交通路网。明代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走向世界的壮举。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极其丰富多彩，不胜枚举。

如宿白所言：“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是吸收了邻近国家和民族，甚至较远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借鉴

的。……任何民族的国家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都是因为其具有优秀、进步的东西。因此,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借鉴都是相互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即使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存在着先进、后进的不同。”<sup>⑥</sup>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明的态度既非全盘接收,盲目崇拜,也非闭目塞听,一味排斥,而是采取理性、包容、交流互鉴的态度。一方面,中华文明向世界文明贡献了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重要发明;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不断地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明内涵。考古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的例证很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精神文明层面对佛教文化及其艺术的接受与改造之外,笔者再举两个物质文明层面的考古学例证。

其一,中国丝绸纹饰的变化。众所周知,丝绸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之一,装饰丝绸的图案和纹饰却在不断丰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丝路贸易的需求,丝绸装饰图案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亚地区萨珊波斯、粟特一带的以连珠大团窠纹内饰以马、鸟、羊等动物形象的造型艺术,经过益州蜀地的吸纳和改造,成为著名的被史书称为“陵阳公样”的大团窠连珠对兽纹图案,不仅流行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成为销行海外的重要产品,甚至成为唐代皇室赏赐给内朝官员和边地君王的重要珍奇之物,深得中国上层社会和一般民众的喜爱。近年在青海吐蕃墓葬中有大量此类织物的残片出土,表明其流布已经远至青藏高原<sup>⑦</sup>。

其二,唐以前中国人习惯席地坐床,没有桌椅之设。桌椅原是地中海东部的习惯,在公元前一千纪传入西亚和东亚,公元一世纪初传进了新疆,四至五世纪的新疆、敦煌壁画中出现了椅子,七至八世纪的敦煌壁画中出现了桌子。765年,西安高元娃墓壁画中第一次在世俗生活场景中出现了椅子。晚唐五代传世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描述了宴席中使用桌椅的情形。这不仅从此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室内布局,也

随之带来了桌椅之上日用器物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我国传统的书籍样式、书写方式、书写工具的一系列变化,宿白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证<sup>⑧</sup>。

综上所述,笔者尤其赞同宿白的一段话:“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和许多民族经过长期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使中国成为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这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中华民族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但是,只有中华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不够的,和中华民族以外各民族,特别和西方几个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和国家直接、间接的长期往还,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相互促进,影响面之广泛,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sup>⑨</sup>古老的中华文明正是在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发展,不断创新变革,以五千年不断裂的优秀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四、结语

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从考古学传入中国伊始,就成为中华民族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时刻重塑全民族的历史认知、重振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最有力的科学武器之一<sup>⑩</sup>。今天,当我们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深入的了解,离不开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认知。考古学具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是可以直接参与国际对话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如何利用客观、科学、详实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向世界展示古代中国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梳理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如何让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和强劲的内生动力,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我深信中国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一定能为之交出合格的答卷。

## 注释:

①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203、204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

②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④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审校,91-10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⑤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审校,105-11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⑥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

⑦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5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

⑧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⑨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⑩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⑪苏芳淑:《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褚馨、代丽鹃、许晓东译,1-2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

⑫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⑭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⑮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359-3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⑯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⑰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自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⑱刘庆柱:《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⑲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张书生、陈高华、谢亮生、一山、索介然、胡志宏译,张书生、杨品泉校订,70、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⑳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36、13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㉑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36、13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㉒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㉓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走近五帝时代》,文物出版社,2019年;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张莉、彭鹏、王刃余、张瀚墨译,王艺、张泉仁、来国龙审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㉔潘岳:《秦汉与罗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㉕孙闻博:《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

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㉗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㉘容庚:《古石刻零拾》,145-152页,中华书局,2012年;《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第十七期,1935年。

㉙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㉚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㉛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㉜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㉝童恩正、龚廷万:《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

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文物》1976年第7期。

③④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27-53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③⑤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53-57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③⑥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汉代石刻精品》，26、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⑦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998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③⑧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③⑨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④⑩韦正：《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④⑪李梅田：《葬之以礼：魏晋南北朝丧葬礼俗与文化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④⑫向南：《辽代石刻文编》，6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299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④⑭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152、153页，中华书局，2009年。

④⑮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④⑯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3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⑰刘庆柱：《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④⑱霍巍：《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157-167页，科学出版社，2023年。

④⑲王溥：《唐会要》，7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⑳王溥：《唐会要》，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㉑陈炳应：《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④㉒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④㉓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㉔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15-17页，文物出版

社，2012年。

④㉕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④㉖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④㉗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④㉘熊文彬：《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

④㉙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④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97-63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㊲甘肃省博物院：《大道攸归：五凉文化展》，71-81页，甘肃省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④㊳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111-11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④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④㊵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④㊶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8-19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④㊷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20-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㊸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1、2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④㊹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234-24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236-264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④㊺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95、104-106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④㊻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2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④㊼霍巍：《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中国考古何以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人民论坛》2023年第7期。